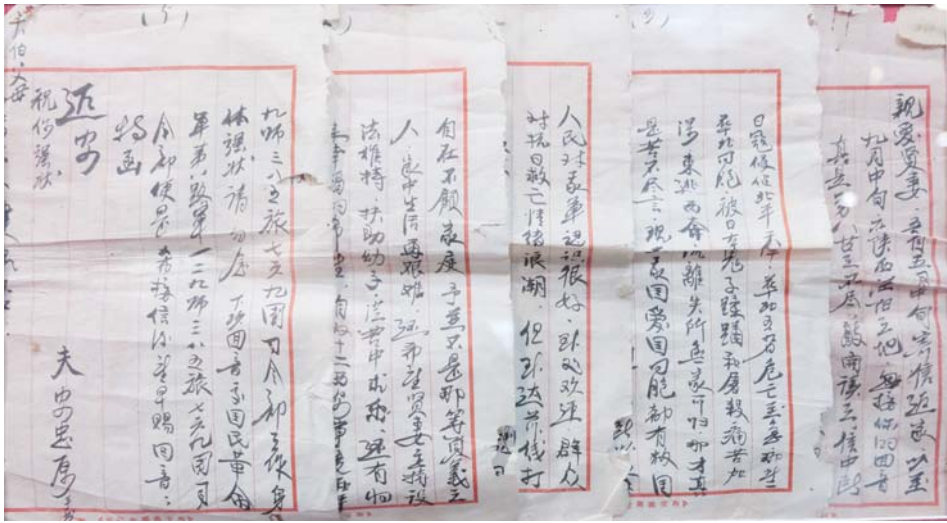


烽烟里的墨痕

黄盼 宋晶晶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无情战火持续蔓延神州大地，浓烈的思念被炮火阻隔千里。1937年，六安人安中原随八路军部队辗转陕西一带，在枪林弹雨之中，生死存亡之际，他满腹的思念与担忧只能伴着笔尖沉甸甸的露水，滚落在粗粝的纸纹里，化作一句句对妻子的思念、一声声对兄弟的嘱托、一次次对父母的愧疚。

1937年4月28日下午，仍在抗日战场上的安中原收到了家中妻子方成宏的来信。还是那么熟悉的字迹，那么朴实而亲切的话语，虽透着生活的愁苦，却仍不忘关心他的安危，仿佛妻子来到身边轻柔轻语，细数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身处动乱的战场，安中原心中却仿佛被人轻轻按下暂停键，翻涌的情绪静止，只留下安稳的空白。他给妻子的回信中写道：“贤妻：予旧历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忽接读次函备诉，一切素知，蒙贤妻美意，高台心悬神驰，苦闷愁肠，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在硝烟间隔，他只能透过信纸，一遍遍摩挲记忆里的那份温柔。念及家中年事

已高的母亲，她的身体健康一直是他最大的牵挂。离家远行前，母亲满是担忧却强装镇定的眼神，那一声声“平平安安，早去早回”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他恨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可战时局势波诡云谲，无国便无家，国为本，家为末，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即便遗憾无法常伴母亲亲侍左右，也只能托付于妻子：“母亲大人年老，玉体衰弱，生活艰难，希望贤妻热心侍奉孝敬，劝慰慈爱的母亲宽心。我在外面光荣，不必心悬忧虑。”

油灯昏黄，思念随墨迹在纸间游走。他不禁又想起家中的儿子贵柱，曾经瘦弱的小小身影紧跟在自己身后，一晃眼竟已到了娶亲的年纪，成长为能挑起门楣的男子汉。舅父一家平日里对他们多有照顾，此次又是亲上加亲，他心中欣喜之余更是感激万分。可一想到自己如今身在远方，不能亲自操持儿子的婚事，安中原挺直的脊背微微向佝，指尖轻轻摩挲信纸，油灯在纸上投下摇晃的光晕，他将满心的歉疚化作笔尖的温柔，字里行间满是复

杂又深沉的情感。闭上眼，他仿佛能看见妻子瘦弱却坚韧的身影，在家中院落与邻里间来回穿梭，为儿子的婚事忙得脚不沾地，每一根发丝都透着疲惫与辛劳。然而，即便遗憾与歉疚如潮水般在心头翻涌，他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并未动摇半分。笔锋轻转，他写道：“我国已到了亡国威胁紧急关头，人民有生死存亡之危险，到那时国亡，家也亡，哪里有什么家庭呢！就是说有万贯家财，又从哪里谈起保守？当前主要是集中国防力量，团结御侮，一致抗日，才是唯一出路。”他憧憬着，待战争的硝烟散尽，自己踏上归乡的路途，定要好好补偿家人这些年来的艰辛与等待，把曾经错过的温馨时光一一拾回，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盼头。

安中原自五月中旬寄信回家，直到九月中旬在陕西泾阳才接到回信。战火烽烟下的泾阳，朔风瑟瑟，士兵们在军营中忙碌着，前线的紧张局势让安中原倍感忧虑。翻看妻子的信，字里行间透出的艰难让他内心愈发沉重。信中提到家中生活的窘迫，妻子默默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照顾着家人，安中原感到无尽的愧疚和心痛。因此，他一番思量，百忙之中抽空又给妻子寄去一封家书。

随着战火蔓延，安中原的军旅生涯并不平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战争愈发激烈，日军侵占华北，民众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惨状令人心痛。他在信中写道：“那些华北同胞被日本侵略者蹂躏和屠杀，痛苦加深，东逃西奔，流离失所。”他感受到来自家乡的呼唤，但也明白自己肩起重任的紧迫。信中，安中原鼓励妻子尽力维持家中生活。尽管内心对妻子怀有深深的歉意，他还是极力劝慰妻子照顾年迈体弱的母亲。他故作轻松地告诉妻子，自己在外抗日救国、为国尽忠，妻子在家里侍奉母亲、为家尽孝，一个尽忠，一个尽孝，做的都是光荣的大事，传出去必定美名远扬。

安中原所在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奉命东进，准备渡过黄河，参与抗击日军的战斗。在这段艰苦的征程中，安中原和战友们在前线打了数仗，虽有胜利，但伤亡也很惨重。他们在陕西的土地上，经

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目睹了战争带来的苦难与人性的光辉。

硝烟散尽的战场归于寂静，安中原终于能借着营帐里昏黄的灯火，伏案写下这封积压已久的家书。他在信中细细描绘着前线惊心动魄的战况，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他在这片土地的赤诚，字里行间皆是战士的豪情与坚韧。“予虽在外，为国家负一份责任，并不像其他军队，虽未担任什么高职，也是为了救国家、为民族、为家庭而奋斗。”信笺末尾，安中原凝视着跳动的烛火，郑重写下对未来的期许，鼓励妻子要坚强，继续在艰难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并期待着下一次通信。

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安中原和他的战友们无数个夜晚共同守望，等待着和平的到来。每一封家书，都是他们心中那份纯粹而坚定的信念，也是他们对未来的期盼。尽管战争的阴霾依旧笼罩，但家国情怀早已在他们的心中扎根，成为了他们抵抗一切困苦的力量源泉。

1937年12月，寒风刺骨的季节，安中原久违地与兄长通信，字迹略显仓促，却字字饱含深情。他迫切地想知道家乡的一切：父母兄嫂是否安好？今年的收成如何？物价是否飞涨，让家人生活艰难？家书中，他提及“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以及“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疯狂侵略的残酷现实。他用简短的文字，描述了战区父老乡亲遭受的苦难：房屋被毁，妻离子散，沦为亡国奴的悲惨境遇。这让他真正目睹了战争的残忍，感受到人民的坚韧，更坚定了他抗日救国的理想信念。他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共同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他历经磨难却依然坚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作为军人的责任和担当，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8年，已任三十八旅旅长的安中原在晋中战役中奉命率部阻击敌人逃跑，作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倒在黎明到来之前。回望他的一生：作为儿子，他满心愧疚于未能常伴母亲左右，尽孝床前；作为父亲，他遗憾错过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珍贵瞬间；作为兄弟，他自责未能为家庭分担更多重负；作为丈夫，他心疼妻子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默默承受生活的艰辛。但在国家大义面前，他无愧于养育他的土地，无愧于指引他的中国共产党。他深知，国若存，家将焉附？身为八路军战士，他的家书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流露，更是那段烽火岁月的见证。后人从中既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无情，也能领略到军人的钢铁意志，更能在字里行间触摸到人性的温暖光芒，体会到战争背后那份对和平的深切渴望。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扫码，品读六安故事

皖西红色旧址 三章

王洪彦

笔架山农校
——皖西最早的党组织旧址

桑条织就的古道
被飞鸟扯得很长
峰峦相连的凹处
你青布素衣，执笔入画
黛瓦叠着岁月的褶皱
青砖结着明清的烟火
古银杏轻扬着山风
门前的月牙塘
墨色润开笔端
“洞天福地”的大门
吞吐云舒云卷
晨钟被蘸血的笔杆撞响
暮鼓送别摧枯的蚕衣
鄂豫皖清晨的一粒星火
从此萌芽、燎原……
而今你怀抱修复的梁椽
置身生死相拼的江山一隅
屏蔽喧哗
潜心挥笔泼墨
画卷里都是
你疼爱的子孙

太平山穿石庙
——立夏烽火策源地

峰峦叠成花瓣
云纱素裹
一东石英巨石飘若玉带
将你轻轻静束
石墙沉静，凝固风云呼吸
古柏苍翠，浸透血色黎明
当人间芳菲零落成泥
唯此山寺
珍藏一隅不败的春色
是谁，在时空的幽谷
于火石垒砌的方寸间
将星火悄然孵化
一叠特油灯，跃动大别山魂
映红坚如磐石的容颜
化作立夏
燃成那朵点亮黑暗
永不凋谢的花蕊

下楼村周宅
——刘邓大军前方指挥部旧址

大别逐鹿，战旗如飞
十二万刘邓劲旅
越崇山峻岭，踏破寒冬
将泰山种植在
这座青砖马头墙
拥你入怀的根子火
炉暖亲切乡音
失而复得的耕牛
犁开漆老爹皱纹
吴大娘的鸡窝蛋
留在灶台上的银元
沉淀鱼水深情
渐渐沥沥的及时雨
打湿老墙上的布告
穷苦人在泪光里
认领自己的土地
鄂豫皖的冻土层
被拨节的春色咋呼覆盖
喜庆的锣鼓喧天
花挑子舞红大门上春联
闪闪的红星在滴滴答答的捷报声
把这座百年老宅闹得红红火火
1948年下楼房春节
军民同欢
集聚的人越来越多
一直到现在

红土地

E-mail: laxwcmztb@163.com

陶因：

以教育薪火 传家国精神

袁 远



安徽大学旧照

安庆，出任安徽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随后又被聘为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1929年秋，法学院正式设立法律系、政治系和经济系，全院共招收学生82人。根据省立安徽大学的相关章程，作为法学院院长，陶因还是省立安徽大学校务会议的成员，直接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的讨论和决定。因王星拱身兼国立武汉大学副校长职务，须经常返回武汉处理事务，陶因便和文学院院长杨亮功等一起，在王星拱离校期间，实际承担起学校的教学和管理职责，确保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1930年3月，安徽大学和安庆市内出现了署名“安徽省教育革进会”的传单，对王星拱进行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和诽谤。王星拱对此感到心灰意冷，不愿卷入安徽教育界派系的非议漩涡，于是主动向安徽省政府提出辞职。在递交辞呈后，王星拱便前往武汉，不再返回安庆。

王星拱决定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陶因、文学院院长杨亮功和理学院院长张其瀾等联名上书省政府，陈述王星拱校长对安徽大学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认为只有王星拱回校，才能“固学校根本”，并恳请省政府全力挽留。他们还表示，自己准备与王星拱校长“同进退”。然而，王星拱辞职的决定已无可挽回。

王星拱校长的离职对陶因震动极大，他没有任何料到安徽教育界内外关系如此复杂。他深感王星拱离开之后，自己留在安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应当履行“同进退”的诺言，便随即递交辞呈，辞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和教授职务。1930年9月，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聘请他为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并给予他最为优厚的特等教授待遇，还将他的一家安置在校内最好的别墅。尽管陶因曾翻译《资本论》，被一些人看作具有浓厚“左”倾色彩，但仍得到王世杰校长的充分信任，允许他讲授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及辩证唯物论等。当时武大的经济系在全国都颇具名气，陶因在任教期间，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多篇颇有学术分量的经济学论文和论著，在国内经济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鉴于陶因在国内经济学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1937年8月，在著名经济学家任凯南先生辞去经济系主任后，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正式聘请陶因先生为经济系主任。之后，他又被聘为教务长，协助王星拱校长管理学校。1938年春，武汉保卫战打响。1938年4月底，武汉大学除毕业班学生之外，其他年级的学生全部抵达乐山，陶因等教师也同时抵达这里，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学界的杰出人才。

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战火，安徽唯一的省属综合性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在1938年夏天的西迁过程中解体了。安徽人深知综合性大学在地方发展中的不可替代作用，纷纷呼吁重建安徽大学。一些在南京、上海、北平的政界和教育界有影响的皖籍人士，也非常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学术地位，在国民政府中积极奔走，强烈要求在安徽重建一所大学，并且主张这所大学必须是高起点的综合性大学，应为直属教育部的国立大学。1946年1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认可了他们的要求，作出决定，重建安徽大学，由教育部直轄，称“国立安徽大学”。不久后出版的上海《申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安徽省立安徽大学，业经行政院决定改组，并拟在原地复校，业已任命筹备大员，主任委员一席，已决定由朱光潜担任，委员兼秘书长决定由陶因担任，其他人亦多属教育界老前辈。”

但是，国立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举步维艰。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朱光潜先生由于个人原因，拒绝来安徽就职筹委会主任。4月19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任命，决定在朱光潜来南京主持国立安徽大学筹委会之前，由陶因代理主任委员。4月20日，国立安徽大学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筹备委员有杨亮功、程演生、章益、叶云龙、陶因、刘英士、刘真如、王培仁及汪少伦，缺席委员包括主任委员朱光潜和委员高一涵、张忠道。会议研究了国立安徽大学的校址、院系设置、开办经费等重要问题。

6月18日，陶因以国立安徽大学筹委会代理主任的身份抵达安庆，全面主持国立安徽大学的筹建工作。尽管南京政府教育部与安徽省政府已确立了安徽学院与国立安大两校分立的原则，但是在原省立安徽大学的图书仪器与校产归属、土地分配、两校系科设置等问题上，仍未有最后结论。在此情况下，陶因通过安徽省主席的介入，才妥善解决了这些难题。记者江枫发表的文章《安徽大学在新生中》曾这样评价：“……经过陶先生两月来辛勤奔走，罗致人才，翔实计划，分工合作，井井有条，短期内工程告竣，《安徽大学》开学有期。”

鉴于朱光潜已无可能来安徽就职，9月30日，教育部正式任命陶因国为国立安徽大学校长。作为国立安徽大学的校长，陶因十分清楚，国立安大的成与败并不取决于校园和校舍建设，而是师资质量。因此，陶因亲自制订《国立安徽大学教授聘任规则》。在国立安大成立前后，陶因利用各种关系，从上海、武汉、南京、北平的大学中“请”来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教授，如：桂丹华、胡稼胎、齐坚如、张宗元、方重、潘重规、金真一、黄叔寅、吴清泉等。